

党内教育制度化:百年回望与经验启示

潘 男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摘要]党内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的一种基本范式,随着形势的变化有其内部不断反馈和调适的演进过程。百年来,党内教育形态发生了以中央紧急会议为早期呈现、以肃反运动为反面镜鉴、以整风运动为优良传统、以整党运动为过渡阶段、以专题教育活动和主题教育为基本形式、以常态化制度化为发展动向的线性渐变。新时期的党内教育要从中深化认知,要始终把党内教育作为我们党坚持“刀刃向内”的强党途径,要使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在党内教育过程中同频共振,要实现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的互补,要完成“关键少数”向“绝对多数”的效能转化,要在变化的阶段使命中固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变主题,要创新巩固党内教育成果的方式方法,以继续保持自我革命传统,更好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党内教育;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党建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21)06-0011-09

党内教育是我们党进行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1]66}列宁进一步指出:“能够代表未来的任何政党的首要任务,就是使自己的成员认同自身的纲领和策略,进而再取得大多数人民的相信与支持。”^{[2]476}“无产阶级所以能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3]510}。在我们党内,要想使“思想的闪电”“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原地”^{[4]467},就要通过教育的手段“溶化他们”^{[5]315}。从历史看来,党内教育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从事理论创造和革命实践的重要范畴,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自身建设历程中进行思想引导、政治动员、管党治党的根本途径。目前,学界关于党内教育历史的研究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以“党内集中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二是认为党内集中教育活动起始于延安“整风运动”;三是侧重于对某一时期、某一重要事件的历史考察;四是研究时段逐渐转向改革开放以后。既有研究成果为深化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内教育问题提供了广泛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但从广义角度和历时性来说党内教育的内涵与外延不仅仅局限于此。党内教育自建党以来便贯穿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以不同的形式面貌出现且发生了将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相结合的历史渐变。立足于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将党内教育研究的历史上限拓展至建党以来、整风运动之前,有助于整体地、连贯地考察和把握百年大党的党内教育实践进程与变化逻辑,以更好地为新时期继续开展党内教育、强化党的自身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党的百年历史也是一部自我革命史与自身建设史。党内教育无疑是我们党从寥寥五十多人不断组织化,进而领导全中国形成“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景象的重要手段。自建党以来,党内教育便在不同的历史关头以不同的形式发挥作用,其自身也有着不断反馈和调适进而制度化的过程。

[收稿日期]2021-06-11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科重大项目(14ZD012);教育部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任务(18JF116)

[作者简介]潘男(1993—),女,福建福鼎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邮箱:1335780288@qq.com。

一、会议、肃反、整风: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教育模式的探索轨迹

回溯党的幼年时期,严峻的革命形势使得中央紧急会议成为进行党内教育的主要形式。

(一) 党的五大与八七会议:党内教育的初步呈现

党的五大和八七会议是建党以来党内教育的较早实践呈现。是时,我们党存在着十分严重的思想混乱、组织涣散问题,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迫使阶级关系重组;二是“清党”“分共”的屠杀政策导致共产党人数锐减、意志动摇,“仅半年时间,共产党人从6万多人锐减到1万多人”^{[6]986};三是驻华代表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接连指示与动荡政局的认识相互矛盾,以致党内主张彼此冲突、难以统一。处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和失败关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成为短期内清扫白色恐怖阴霾、正确认识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的被迫之举和迫切之需。

为此,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半个月后,党的五大会议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二次革命论”右倾理论观点,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加强农民斗争的建议,并强调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体来说,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之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进一步揭露了蒋介石确实变成军阀的友军和帝国主义的工具之事实,指出“革命的国民政府,欲战胜反革命的阴谋,必须要在自己领域内消灭反革命的根基”,“在现在的革命阶段中,国民革命必须和农民革命吻合一致”,因此,“‘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可以建起雄伟的革命军队,并能使革命永立于不败之地”^{[7]222}。《土地问题决议案》更是首次提出以土地革命发展农民暴动的倡议,在“农民运动的前途,必然是土地革命”^{[7]191}的认知基础之上制定了土地革命的七个要点、九条方针。《职工运动决议案》提出“要发展工人教育”、“要多注意政治的教育”和“到军队中去、拿枪去”^{[7]203-204}的职工运动新方针。《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也是是时我们为寻找合适的前进路径所形成的重要方案。与此同时,《组织问题决议案》在党的历史文件里首次出现“民主集中制”和“政治纪律”的概念,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7]208},要求建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制度。

与党的五大不同的是,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八七会议将没有得到落实的土地革命政策口号转变为具体行动,结束了党内存在的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路线和政策。继1927年5月《中国问题决议案》指定罗明纳兹成为新的共产国际代表后,他在会上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开场即指出:国际要中国共产党集此会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但因非召集此会不能改正过去的错误,所以仍坚决地召集一些与群众比较接近的领导者来开此会,我们要指出过去的错误,并须使此错误为大家所认识^{[7]386}。由其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在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创造军队等中国革命的发展问题上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强调“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要强化党在土地革命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并主张“几千万农民自己自上而下解决土地问题”^{[7]420-421},在此之上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而《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进一步对工人运动在领导、组织、训练等方面提出要求。《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在组织问题上提出了建立本党全国交通网和形成坚固的秘密组织的要求,且“凡破坏纪律者,都应从严惩办”^{[7]449}。《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要求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相结合,毛泽东也创造性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作为革命危急时期的两次中央紧急会议,尽管党的五大和八七会议在“右”和“左”上都有明显的错误,但在总体上对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是“既涉及党的指导思想或路线是非,又涉及历史内容巨大变化的转折”^[8]。通过会议的举行和会议决议的形成,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观点和行为倾向得到批判、党内矛盾和争论得以部分解决,在关键时刻使全党先后有了对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等问题之基本正确的认识起点和实践转变点,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较好的教育效果。

(二) 古田会议与遵义会议:党内教育的直接开展

古田会议直接给予党内教育问题以重大关切。是时,至少有八个错误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蔓延在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原因有二:一方面,大革命失败的现实和工农武装斗争的复杂形势决定了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机关既没有对这些错误的思想进行“一致的坚决的斗争”,又没有对党员进行充分的“正确路线的教育”^{[9]78}。这些不正确的思想严重妨害了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因此,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针对“党内教育问题”单列篇章加以说明。其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因而要“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9]94}。一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二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三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四要“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五要“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六要“从思想上、制度和政策上肃清盲动主义和纠正盲动的行为”^{[9]80-88};七要用规定的十种材料和十八个方法去教育党员和党的指导机关^{[9]94-96};等等。古田会议及决议不仅对党内错误思想及其存在原因进行深刻剖析,还提出要以党内教育作为思想建党的重要手段,系统阐明了开展党内教育的意义和方法,不仅在党内教育史和党的建设史上画下了浓重的一笔,对党的建设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遵义会议作为党领导民主革命历史发展的生死攸关转折点,亦产生了巨大教育效益。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党继大革命失败后又接二连三经历了“左”倾错误的曲折,直至遭遇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的挫折,向何处去的问题被摆到历史的舞台上。为挽救处于危急关头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从根本上拨党中央军事领导路线之乱,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原则及其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写道:“政治局扩大会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们党的整个路线来说,不过是部分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不足以使我们悲观失望。党勇敢地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地来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党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10]676-677}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的一个关键会议,不仅仅重新确立了正确的军事和领导路线,更是完成了一次从中央扩展到主要军事指挥人员的自我革命、自我教育,以思想、政治、行动的统一挽救党于危急时刻。

上述会议在时间上仅持续一至两天且在规模上局限于中央、红军内部,虽然与后来大规模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有所不同,但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具有里程碑式的集中教育效果。正如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所言及的:“会议不仅解决了问题,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要考察问题的环境,要参考上级的指示,这样就发动了同志们的心思才力,由会议的政治化与实际化,同志们每个的头脑也都政治化实际化了。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党的战斗力就强大起来了。这就是会议的教育意义。”^{[9]91}历史也已经向我们证明,无论是党的五大、八七会议,还是古田会议、遵义会议,这几次涉及党的指导思想、路线是非与历史内容巨大变化的中央紧急会议不仅是党在其幼年时期十分重视党内教育、采取党内教育的做法的直接历史呈现,还确实产生了极大的教育成效。

(三) 肃反运动与整风运动:党内教育的反面镜鉴与优良传统

20世纪30年代的肃反运动作为一个时期内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党内教育史无法回避的悲情岁月。但邓小平同志指出:“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11]272}我们应该不仅看到这一历史悲剧带来的严重后果和损害,同时也要看到它作为党内教育实践的反面案例所提供的镜鉴。故而,在此将肃反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联系在一起,也是旨在通过连续的历史事件和党的认识变化来更加全面地把握党内教育模式和方法的动态演变。如果说肃反运动为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提供了“前车之鉴”,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则充分吸取肃反运

动的惨痛教训,以马克思主义党内教育运动的方法从此开启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党内集中教育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承上启下,奠定了党内集中教育的基本模式。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党员人数从大革命时期不到6万发展到开展整风运动时达到80多万,党员成分愈加复杂。就在党内仍然遗留着早期产生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基础之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在对党的组织肌体造成侵蚀。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939),明确强调:“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12]580}故而,一场从延安开始、辐射全党范围、再到延安结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有序展开。1941年至1945年近4年间,我们党的这次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任务,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基本方针,先后经过高级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全党整顿三风、总结经验三个阶段。随着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三套历史文献(《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条路线》)的出版和学习,全党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在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中对整风运动有了新的认知并形成共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整风运动的主要结晶标志着党内思想初步达到了统一。可以看出,与肃反运动截然不同,此次整风虽然表现为一种政治运动的模式,但正如毛泽东所言及的“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6]827-828},整风运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区分了党员反党反革命行为与工作错误的不同性质,避免了此前简单粗暴的党内斗争方式,开辟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教育实践的新高度。其不仅为紧接着的“三查三整”整党整军运动提供了党内教育的典范,还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进行党内集中教育和党建工作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正如毛泽东所认为的,若能真正做好党内教育和党的作风整顿工作,则“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13]444}。

二、从政治运动到专题活动:改革开放以后党内教育模式的转变过程

(一) 整党运动:党内教育的过渡阶段

1983年发起的整党运动是党内教育介于政治斗争运动和专题教育活动之间的过渡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这场整党运动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是长期以来的错误“左”倾实践危害和“左”倾错误思想仍未消散;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不可避免带来了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尤其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致使全党和全社会蔓延开来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因此,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提出“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整党任务来纠正党内作风和社会风气。与此前的党内教育运动不同的是,这次整党代之以“从中央到基层组织,自上而下、分期分批地整顿”^{[14]708}的步骤和基本方法,避免了过去大搞群众运动导致的“左”的错误。一方面,邓小平指出:“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15]336}另一方面,邓小平也强调:“不搞运动不等于政治工作没有方向,也不是不要声势。在以后一个适当时间,还要进行整风。不搞整风,恐怕解决不了问题。”^{[15]381}故而,1983年的整党与此后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又有所不同,其仍有继续“斗争”之意。所以说,1983年的整党处于政治斗争模式向专题活动模式的转变之间,是党内教育模式的一种特殊状态和过渡模式。此后,党内教育模式才真正隐去政治运动的斗争色彩,增添了专题教育的活动色彩。

(二) 专题教育活动:党内教育的基本形式

三讲教育正式开启了以专题教育活动为模式的党内集中教育的历史。随着改革开放不断纵深化,我们党和国家在世纪之交面临着重重的考验。一方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加剧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施压和挑衅,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进行长期执政是个根本问题。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下中国社会的经

济关系和生活方式迅速多元化,如何使党的建设跟得上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步伐成为突出问题。与此同时,党内党员人数、组织规模、队伍成分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党内状况之中管党治党成为一项挑战。为应对这一“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16]452}的时局变化,1995年江泽民提出全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风气”。1999年至2000年间,全党在相关意见的指导下分期分批集中开展了以“三讲”为专题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这次党内教育活动虽然明确要求发扬整风精神,但其以不搞政治运动的集中教育形式对党内70余万领导干部、500万干部群众进行党性党风上的大规模教育和整改,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也为日后我们党依靠党内教育解决党内突出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子和经验。自此,我们党内先后开展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5—2006)、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2008—2010)、“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活动(2010—)等专题教育活动,基本上延续了延安整风精神和三讲教育活动的历史经验和方式方法,塑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八大之前党内教育的基本模式,在不同时期化解党内不同的突出问题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三、制度化色彩增强:新时代以来党内教育常态化的发展动向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后党内教育实现了由政治运动模式向专题教育模式的转变,那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党内教育实践则呈现出由专题教育活动向主题教育活动转变的动态发展过程,并逐渐弱化了“活动性”的特征,增强了“制度化”的色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更好地在改革开放深水区中整治“四风”问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连发起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共计4次党内教育活动。这几次党内教育活动在具有集中性的基本属性之上,又具备经常性的发展态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党中央的官方文件体现出将党内教育逐渐由集中教育活动转变为经常性工作的意向和趋势。事实上,从党的十八大之前开展的“争先创优”活动开始就已显露苗头。2010年4月5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意见》开篇即定调,明确“创先争优”活动“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17]622}。201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提出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这一重大政治任务融入经常性学习教育、与日常工作有机融合的要求。2016年2月28日,《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指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不是一次活动”而要“突出正常教育”“抓在日常、严在经常”^{[18]1-2}。由此可以看出,党中央关于党内教育的认知已经具备一定的常态化、制度化意识。

二是党内教育实践从具有制度自觉意识发展到具有制度体系基础。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开展党内教育基本都有章可循,其多以“决定”“决议”“指示”等文字命名,除上文提及的文献外,还有诸如《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1942)、《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1951)、《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195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1951)、《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4)等关于整党整风的指导性文献。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八大之前,我们党迈出了党内教育制度体系构建步伐,颁布了一系列包括《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0)、《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干部教育工作的决定》(1980)、《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通知》(1983)、《关于充分运用宣传工具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的通知》(1983)、《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1997)、《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2001)、《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

行)》(2004)、《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2009)、《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2010)等在内的涉及党内教育问题的制度法规。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19]237}在此基础上,相继制定或修订了《2014—2018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2014)、《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2014)、《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2015)、《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2016)、《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继2003年之后又于2015、2018年作了两次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2017)、《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2017)、《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18)等事关党内教育的规范性文件。直至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了会议决定,正式要求“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透过这些文献可以窥探出党内教育制度化的发展进程,其不仅由自觉意识上升到思想理论,还由思想理论推展至具体实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在制度体系建设上不断加以健全和完善,累进形成了新时期党内教育新局面、开启了新征程。

回望党的百年历史,党内教育以解决各个时期党内突出问题为导向,经历了由政治运动模式到专题教育活动、再由主题教育活动到建立制度的发展过程。从历史与现实这两条基本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到,我们党不断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总结了经验、巩固了成果,逐渐摒弃了政治运动的斗争色彩,弱化了活动“一阵风”的特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增强的制度意识、日渐成熟的制度构想、点滴积累的制度体系基础、党内教育长效化常态化的发展动向。实际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由专题活动转变成为一项制度设计,也正象征着党内教育正式走进了常态化制度化的轨道。

四、百年大党推进党内教育的经验启示

如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那么党的建设则是久久为功的大工程。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不断以自我教育推进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推进自我建设和社会发展,就是我们百年壮阔党史的真实写照。事实证明,党内教育不仅以不同的历史形态出现在党的建设发展全过程,还开创了我们党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党内问题的基本范式。习近平总书记在《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强调:“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20]121}因此,在特殊的时间节点对党内教育历史进行溯流穷源,就是要像“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时候宣示下一个70年”一样^[21],深入分析总结出党内教育的成功经验和有益启示,在建党100年的时候宣示党的下一个100年。

首先,要始终把党内教育作为我们党坚持“刀刀向内”的强党途径。自我革命与党所进行的党外革命相对,是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和一种政治勇气。在党内进行自我革命,目的就在于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做斗争,既要敢向长期积存的思想上的顽瘴痼疾开刀,又要敢去冲破阶级利益固化的藩篱。建党以来,我们党所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自我革命是党在各种风浪考验中依旧朝气蓬勃、葆有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关键原因。而自我革命往往是依靠党内教育手段得以完成。通过党内教育,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多次挽救自身和革命事业于危难之中,解决了党的指导思想与路线是非问题,改善了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于纷乱复杂的时局中从思想上、行动上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曾讲过:“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22]297-298}这一讲话内容正是揭示了党内教育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所体现的解决问题的原理和“看齐”的功能。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在思想和政治上的看齐比形体上整齐队形更难^{[20]103}。故而,我们党只有经常喊看齐,不断将党内领导干部、党员群体集中起来教育培训,才能时刻保持警醒、实时进行

纠偏。因此,要把党内教育始终作为我们党从思想上行动上自我革命、自我纠偏、强化自身建设的长久之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内教育予以充分重视,在合理借鉴百年来党内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先后开展了4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既延续了党内教育的历史和传统,又对党内教育提出了制度化的创新与发展要求,进一步增加了党内教育的强党功效。

其次,要科学把握关于党内教育问题的几对关系。党内教育经历了“政治运动—专题教育活动—主题教育—制度建设”的模式变化过程,既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也在艰辛曲折的探索过程中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很强的反思精神,不断反省自己、完善自己。”^{[20]114}这就是要求我们要从党的百年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加深对党内教育问题的科学认知。

第一,要使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在党内教育过程中同频共振。思想建党是开展党内教育的目的第一性。从革命时期开始,毛泽东便创造性地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党内教育原则,力求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保持全党思想的纯洁性、统一性。而制度治党作为思想建党的有益补充,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历史“试错”下的反思产物。1980年,邓小平指出我们党过去发生错误就在于没看到“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5]333}。当前,制度建设更是贯穿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之中,制度治党成为开展党内教育的目标归宿。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让制度和教育二者刚柔并用,形成管党治党的合力。事实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逐渐成了开展党内教育的两翼:思想建党是进行党内教育的固本之策,体现为理想信念、党性党风等本质规定与内在修养的自觉习成;制度治党是进行党内教育的长久之举,体现为政治规矩、纪律法规等外在约束与刚性要求的自觉遵循。因此,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动摇、建立健全相配套的制度体系、结合制度要求落实规范是应有之义。故新时期的党内教育就是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23]。需要指出的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居于首要位置,这就要求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还要围绕政治建设的统领,共同画出党内教育制度化的“同心圆”。

第二,要实现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的互补。“集中性”和“经常性”是党内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一对重要范畴,与党内教育演进尤其是所采取的模式息息相关。从党的历史上看,党内教育长期以运动或活动的形式存在,短则间隔数月,长则间隔数年,且分批次进行。这种集中性教育的方式有助于在一个时期内集中火候以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问题。但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往往是短时规划而非长久之计,是间歇发动而非战略之举,不仅无法确保党的新思想新理论及时渗透到全党之中,也无法应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因此,党内教育在集中性教育活动之上逐渐增添了经常性工作的属性。换言之,我们党需要用经常性工作来破解集中性教育所无法破解的问题。事实上,《党章》将“接受党的教育和培训”规定为党员权利的第一条,这就说明党内教育要将集中性教育的经验和成果融入经常性教育之中,同时也要在经常性教育之上进行集中强化。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先后开展的党内教育活动不仅具备集中性教育的基本形式,也具有经常性教育的基本属性,更提出了常态化制度化的更高发展要求。因此,新时期党内教育要进一步探讨在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主题教育与制度建设互补之上的有效衔接、科学互融、合理承转的问题。

第三,要完成“关键少数”向“绝对多数”的效能转化。回望百年历史,不同时期的党内教育实践均围绕着不同的对象开展。比如,古田会议以党内红军为教育对象;延安整风运动的对象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再是一般干部和广大党员;三次整党运动既有对从党的领导机关到基层组织的各级组织的整顿,又有全党范围内自上而下分批分期进行的全面整党;“三讲”教育对象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先进性教育活动则有县以上党政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城市基层和乡镇机关、农村和部分党政机关三批对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县级以上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全体党员参加;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对象;“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以县处级以上领导

干部为对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为对象,党内教育自此真正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开展。由此可以看出,党内教育运动和活动在纵向上划分批次,且在横向上圈定对象,但总体而言逐渐由“关键少数”转向广大党员乃至全党。毛泽东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4]326}这就说明,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层层传导是我们党开展党内教育所形成的重要经验,实现了教育效能由点推及面。“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对全党全社会都具有风向标作用。”^{[25]422}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内教育也要进一步以分类指导为组织原则,充分发挥“关键少数”对绝大多数党员的示范、带动作用,实现党内教育效能的层级转化。

第四,要在变化的阶段使命中固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变主题。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6]289}换言之,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之痛。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党内的集中教育构成了党内教育百年历史的一条主要线索。不同时期具体的矛盾问题是共同推动党内教育运动和活动开展的根本动力。这也相应决定了党在不同时期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有所区别。而实践却证明,无论时代条件和社会发展的阶段使命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与时俱进的党的思想进行理论武装,这又是党内教育一以贯之的本质规定和不变宗旨。党的十八大以来,尽管面临着“四大考验”“四大危险”,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根本遵循,在不变之中又通过不断调整党内教育实践以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因此,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基础之上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恰逢其时。

再次,要创新巩固党内教育成果的方式方法。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为坚守初心、担负使命断断续续开展了各类党内教育运动和活动,日渐形成了稳定的经验传统与丰硕成果。譬如,以“团结—批评—团结”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就是党内教育制度化进程中的重要经验,是党内教育经常化、规范化、科学化所应继续巩固和始终秉持的正确原则和方式。这些丰富的成果也反过来使新时期的党内教育有源头可溯、有方法经验可循、有对象要素可用、有信心希望可靠。因此,巩固党内教育成果可以在既有基础上使党的自我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越来越重视对既有党内教育成果的巩固,并专门针对党内教育成果的巩固提出了9条意见和各项配套任务。党内教育成果的巩固以这些任务的有力执行为实现前提,但目前这些任务的有效完成基本依赖于文件规定,或是以新一轮的党内教育活动来巩固上一轮党内教育活动的成果,尚没有形成巩固党内教育成果的健全机制和特定手段。因此,必须要探索和创新变化形势下巩固党内教育成果的方式方法,在将党内教育活动自身作为手段的基础上,还要在党内教育的制度化进程之中寻求成果巩固的制度化。

回望党的百年历史,已往不谏,来者可追。我们党以依靠自身力量为特点、以解决党内突出问题为导向,开创了党内教育这一管党治党的基本范式,并在这一基本范式的不断反馈、调适的演变过程中确立了当下较为科学有效的自我教育模式。固其根本、浚其源泉,这些在艰辛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慢慢探索和积累而来的党内教育的长足经验,构成了新时代我们党实现党内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制度基础和更好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可贵财富。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列宁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8]石仲泉.从党的五大到八七会议——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转折[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8(1):1-6.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十六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1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6]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8]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9]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 [20]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1]佟明增.宣示下一个70年[J].共产党员,2019(16):31.
- [22]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23]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2).
- [2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李思远,黄 燕]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ner-Party Education: One Hundred Years Review and Experience

PAN Nan

(School of Marxism,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Inner-Party education is a basic paradigm initiated by the CPC to solve prominent problems within the Party relying on its own strength. As the situation changes, there is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continuous internal feedback and adjustment. In the past 100 years, the pattern of inner-Party education has undergone a gradual linear change with the emergency meeting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s its early appearance, the movement of the suppress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as its negative mirror,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as its fine tradition, the Party consolidation movement as its transitional stage, the special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themed education as its basic form, and the norm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as its trend.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er-Party education, and always consider it as a way to insist on “the blade inward” approach to strengthen the Party.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fine tradition of self-revolution and better promote the new great project of Party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the ideological Party-building and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resonate at the same frequency in the process of inner-Party education, to realize the complementation of centralized education and regular education, to complete the efficient transformation from “key minority” to “absolute majority”, to solidify the unchangeable theme of “staying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keeping always our missions in mind” in the mission of the changing stage and to innovate ways and methods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inner-Party education.

Key Words: inner-Party education; ideological Party-building;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